

苏颂：博学爱民 清白传家

张沧海



苏颂芦山堂

八闽东南，鹭岛之北，有一座人文丰厚的千年古城——同安，雅称银城，现在是厦门市的一个辖区。同安城西北隅葫芦山南麓，有一座海内外乡亲引以为荣的苏氏祠堂——芦山堂。

这是一座三进双护厝式的府邸，典型的闽南风格建筑，红砖砌墙，红瓦布顶，飞檐画栋，朱门雕窗，古朴庄重。冬日的暖阳，斜斜地照在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书题的“苏氏大宗”匾额上。门前的两尊小石狮，憨态可掬，给芦山堂平添了几许活泼、几分生机。正门的一副楹联——“尚书御史翰林第；将相公侯科学家”，精妙地概括了这座府邸以及府邸主人的生平履历。

每年，都有来自海峡两岸以及美国、东南亚等各国的乡亲到这里祈祖敬贤。因为，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芦山堂诞生了一个男婴，他就是后来光耀苏氏芦山衍派的北宋宰相——苏颂。

苏颂（1020—1101年），字子容，我国古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主持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被誉为“钟表的鼻祖”，主持编著的《本草图经》是我国古代的药物学巨著。苏颂历经五朝，历任知州县、转运使、部堂，最后升至哲宗宰相。去世后，南宋理宗赐号“正简”，因此他的出生地同安素有“正简流芳”的美誉。



苏颂正流简芳

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苏颂不失为宋代一位持重稳实、清廉爱民、处事精审、正派直道、利国利民的名臣。他历经五朝，为官清正，远避权宠，不立党援，遵制守法，顾全大局，团结民族，颇得民心，深为时重。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这样评价他：“赵郡苏公，道德博闻，号称贤相，立朝一节，终始不亏。”

作为为我国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伟大科学家，苏颂更是一位勤奋好学、博广精深、善于继承、勇于创新、不畏劳苦、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才华横溢的科学巨星。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高度评价苏颂：“苏颂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历史上，做一个历经五朝、从政五十多年的名臣、贤相难，既做一个名臣贤相又做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那就难上加难；在科技史上，一个人要在一个领域领先世界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难，而要在多个领域领先世界并为人类作出贡献，那更是难上加难。

唯独苏颂，他不畏这“难上加难”，以他“五岁父口授孝经、古今诗赋，皆成诵”的禀赋才华，以他“平生少睡，虽三鼓枕，至五鼓不复瞑”的刻苦勤奋，迎难而上。从政同时，在崎岖的科学道路上不畏劳苦地登攀，终于到达光辉的顶点。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夏至过后一日，黎明时分，在江宁京口（今镇江市）一座简朴粗陋的宅第里，一位耄耋老人含着欣慰的微笑，坦然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

东方渐渐地露出了曙光。这一天，雄鸡照样报晓，太阳照样升起，可是，大宋江山却失去了一位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骄子！

为了这位老人的谢世，宋徽宗下诏“辍朝二日”并派中吏临丧致哀。朝野士大夫纷纷写挽词、致哀诗，“吊唁赴丧者甚多”。

当吊唁赴丧的官员赶到苏颂的“相第”时，不禁个个都目瞪口呆：堂堂的大宋宰相府，却是一所“仅蔽风雨”的简陋住宅！面对与这位相爷毗邻的高宅深院、名园甲

第，这些“来吊哭者”个个喟然长叹、唏嘘不已。“见其服用俭素，皆叹息而去。”在污浊的宋代官场，人们对这位廉洁节俭的宰相，含着热泪，真诚地奉上了发自内心的肃然和崇敬。

苏颂，不仅是世界级的科技巨人，更是勤政清廉的官场典范。

让我们怀着敬畏之心，一页页翻开这位大宋相爷的廉政史册吧！

惠爱于民此最亲

惠爱于民此最亲，这是苏颂受任地方官时写的一首《次韵王伯益同年留别诗》中的一句。

“诗言志”，苏颂把“惠爱于民”作为当官的最高使命。他一生五次出任地方官，每赴一任，都是尽其所能，身体力行，全力以赴，为民造福，因而深受百姓爱戴。

提点开封府界县镇公事时，苏颂亲自兴修水利，保田防灾。他“建请浚自盟、白沟、圭、刀四河，疏畿内积水”。知仓州时，遇黄河泛滥，苏颂立即上书，“奏乞开修破藏口复三堂分杀黄河水”，并且经过实地调查研究，提出疏引黄河水的办法。而后，他不辞劳苦，深入灾区，亲预其事。

在杭州任内，他记挂辖区水涩百姓饮水不便，把凤凰

山的甘泉水引入辖区做自来水用，黎民百姓，皆大欢欣。

出任江宁县知县时，苏颂明察暗访，核实丁产，造册课税，严惩一批瞒产逃税的劣绅，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嘉祐六年（1061年），苏颂被派到颍州出任知州。这期间，朝廷为筑皇陵向州县派贡，州县纷纷加派肥私。苏颂却一边上书为民请命，一边由官府出面，用变通的办法完成了任务，老百姓还不知晓情况。

苏颂关心民瘼、体恤百姓的爱民之心深为皇帝所知。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苏杭地区再次受灾。在选任地方长官时，宋神宗深有感慨地说：“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再次委任苏颂前往灾区。

元祐六年（1086年），苏颂受命研制水运仪像台。很难想象，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爷，竟能长年潜心基层，组织领导一班“布衣”，与他们平起平坐，促膝切磋，侧耳倾听他们的意见，博取他们的建议，不断补充完善学术上的疏漏和不足。

一个官吏能否清正廉洁，其根基是爱民。凡真心诚意为民谋利、爱民如子的官吏，绝大多数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那些以晋升和私利为目的的官员，绝大多数都难逃贪腐的泥淖。

苏颂从二十三岁入仕，直到八十一岁拜太子太保，八十二岁病逝于江口，一生从政，始终关心民瘼，体恤百

姓，把“惠爱于民”作为最高使命，从而奠定了他廉政思想的坚实基础。

故里碑与熙宁三舍人

同安通往泉州的古驿道，凤山与九耀山之间的岭头崎上，有一座木石结构的甘露亭，人称“接官亭”，亭的东南侧，至今仍屹立着一方古朴的石碑，人称“故里碑”。碑的正中阴刻“宋熙宁三舍人丞相正简苏公故里”文字。两侧纪年落款为“大清光绪六年荷月吉旦、知同安县八十四敬立”。解读碑文，其中“丞相”是苏颂的官位，“正简”是皇上赐的谥号。但令人困惑的是：碑文中“熙宁三舍人”既非官职，又非谥号，为什么却冠在“丞相”“正简”之上？更令人不解的是，岁月流逝，八百多年过去了，为何这位同安知县还毕恭毕敬、奉若遗珍地把“熙宁三舍人”镌于碑石，宣示过往的大小官员呢？

原来，这是一桩发生在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有关官员选拔的重大政治事件，在当时震动朝野、风闻天下。

宋熙宁三年（1070年），苏颂时任工部郎中、知制诰，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其时王安石推行新法，受到保守派司马光等人极力反对，这时任宰相的王安石请求神宗破格提拔一名地方官李定到朝中任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苏颂不反对新法，还对青苗法的施行提出过有益的

建议。但是，事关为国家选拔人才，苏颂认为要慎之又慎，特别是越级提拔，必须是“非常之人，声名显闻于时，然后可以压服众议”。而李定仅靠讨好宰相王安石，巧对神宗质询，就“一言称旨，便授台官，此乃度越常格，隳紊法制”，是违反官吏擢升条例的。时为中书舍人的苏颂，冒着丢官甚至杀头的风险，与他的同事宋敏求、李大临一起，前后八次退还皇帝的批条，“封还词头，不予具草”，就是不肯起草任命书。

在皇权至上、君命不可违抗的封建时代，苏颂抗旨的背后，是无畏的勇气和牺牲的精神。幸而，宋神宗还算明君，没有置他们于死地，只是因违旨抗命，三人均被撤职外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熙宁三舍人”事件。

时间是无言的批评家。靠投机钻营、媚上取巧的李定，终因政绩平庸、不尽孝道、制造“乌台诗案”文字狱以及弄虚作假，一再被贬，“晚岁去位，人人唾骂”——这就是历史公正的裁决。

坚持原则、维护法制的苏颂在“三舍人”事件后，“宾客满门，人望益重”，天下人“高其节”，得到了社会舆论的赞誉和支持。

是的，吏治是否清明、任才是否得当，是关乎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苏颂主张官吏的任用升迁应用法制来管理，不能用长官意志代替选才的法制，特别是他在选拔人才时坚持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高风亮节，不但在当时

证明是正确的，时至今日，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苏颂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虽持重稳实，不立党援，终生为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恪尽职守，但统治阶级内部钩心斗角地争权夺位，使他也不能幸免。他曾两次因司法案件被贬官、入狱。一次是宋元丰元年（1078年）十一月，苏颂权知开封府，因孙纯案受牵连，受到了撤职处分（降秘书监，出知濠州）。另一次是宋元丰二年（1079年）九月，苏颂在濠州任上主审陈世儒案时，苏颂因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而被人诬告，大理寺派人至濠州逮苏颂赴狱对质，苏颂由知州变成了囚徒。

苏颂的入狱、受审，对苏颂的人品操守是一次考验。他顶住了神宗的压力，宁可自身蒙屈受祸，绝不枉诬他人，正如他诗中所写，“唯有丹心贯金石”，“直道公心自不欺”，这种坚贞诚实的高尚人格是很难能可贵的。更重要的是，苏颂的囚徒境遇，让他实际体察了北宋王朝的司法现状，特别是执法者在审理过程的逼供、诱供，狱吏对囚徒的威胁、引诱、百般刁难以及监狱的黑暗。这对苏颂的法律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苏颂从政共五十六年之久，其中担任与法制有关的官职有大理寺丞、知审刑院、刑部尚书，在江宁知县、颍州知府、开封府尹任上也主管审案理狱。苏颂为官之时，正是宋朝危机四伏的年代，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苏颂提出并实践了自己的一系列法律主张，主要有：

法贵简当，立法从简。针对北宋法令刑狱滋繁现象，苏颂提出“立法从简”的法律主张。他认为，立法“欲其简约而明白，使人易避而难犯”。尤其对当时编敕太多，前后牴牾的时弊，提出修法“务必简易，使便于施行”的基本原则。他主持编修元祐敕令，使人“简而易从”，“久而无弊”。

循法办事，执法严明。针对当时官吏无能、赏罚不明、执法不公、职责不明的流弊，苏颂提出从执法者入手，明确职责、严格考课、按能授任、职责分明的主张，把官吏中“以令长能用善道渝民，勉末游而归本业，至狱讼稀简而盗贼衰息者”评为优等。苏颂本人也身体力行，严格循法办案，不信口诬，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宁可自身遭受诬陷，也要坚持谨慎态度，维护法律尊严。

省刑减杀，重在教化。苏颂深受儒家仁政、德治思想的影响，反对使用刻薄之法，主张“省刑减杀”。但对于那些生性凶暴、顽固不化之人，苏颂仍然主张严惩。他特别强调“化暴恶为良民，使愚俗知教化”，使“无知之民，一时犯罪”有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修法施宜，守法自觉。苏颂整顿法制，一是力求法律“划一”，反对法律朝令夕改，但也反对法律一成不变；二是主张“必因时而施宜，视俗而兴化”，对那些不合时宜、不合情理的法令，应根据事实和需要进行大删改。“可删者删之，可改者改之，择其要切者，著为新令”，这样才

能克服旧法之弊，“便于施行”。

苏颂为官清廉，执法如山。他因为刚正不阿，依法办事，几次被罢官和贬职，但他仍对自己要求严格，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不肯随波逐流，始终坚守“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通过长期的法制实践，苏颂积累了丰富的治法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制思想，贯彻于其立法、司法、守法等过程中，值得后人研究与参考。

虽贵，奉养如寒士

苏颂一生为官，任过地方官，任过选拔官吏的考官，任过考核官吏升迁贬黜的吏部尚书，最后当上了宰相。他掌管着全国的行政大权，却始终两袖清风，即便家用不足，仍保持着清廉节俭的美德。

《宋史·苏颂传》记载：苏颂任馆阁校勘九年，仅以薄俸养“祖母及母，养姑、姊妹与外族数十人”，“妻子衣食常不给，而处之晏如”，有客上门，竟“不能备一酌”。任尚书、宰相时已然是中央大员，却“贍给常苦不足”。为了节用，他常常用裁下的碎纸片写字，“未尝妄费寸纸，每剪碎纸为签头，稍大者抄故事”，并教育子孙们将节俭牢记于心，见诸于行。

苏颂把他的节俭美德凝结为一种清廉思想，并想把它

推向政坛，影响社会。他不仅教育自己的子孙，将俭朴之风、廉洁之德世代相传，而且还想推而广之，使举世皆行节俭之风，廉洁之德。为此，他借用先帝之名，规劝皇帝、后妃和皇亲国戚。

当车轿、衣饰涂金之风盛行，上下讲排场、争奢华，大修楼堂馆舍时，苏颂引用先帝遗诏，上书皇帝说：“先帝严禁涂金之令，所以戒谣侈，而敦质素也……京师无名土木，营民费财，望戒内外，不急修造及佛祠、神庙悉皆禁。”他以身作则，升任宰相之后，住宅依然简陋，乃至下属们都说，这样的“府第”实在与宰相身份“极不相称”。可又有谁知道，这位相爷，除此“蜗庐”之外，竟“四方无尺椽寸土”！

史学家对人物的评价，历来讲求“盖棺定论”。曾肇写的《赠司空苏公墓志铭》中，是这样评述苏颂清廉节俭的：“家贫，担石不充，无愠色”，“优以礼法自持，虽贵，奉养如寒士。筑第京口，仅蔽风雨。比薨，来吊哭者，见其服用俭素，皆叹息而去”。

官至宰相，苏颂门前没有前呼后拥的阔绰排场，没有花前月下、笙歌不绝的闲情逸致，更没有灯红酒绿、众官酩酊的骄奢横逸。陪伴苏颂的，是明月清茶，是政务之余的博览群书、广猎博采……

“成由勤俭败由奢”，今天回过头来，重读苏颂的廉政史绩、节俭品行，其现实意义自是不言而喻。

世胄相传清白训

芦山堂二进大厅的大圆楹柱上，有一对后人摘录苏颂诗句的楹联：“世胄相传清白训，源流同是子卿孙”，翔实地彰显了苏氏大宗世代相传的清白家训，也揭示了苏颂作为名臣贤相以及后代清廉从政的原因所在。

苏颂出生在“七世仕本朝”的望族，苏氏有诗礼之家的传统，祖父苏仲昌、父亲苏绅都是当朝官员，苏颂的母亲出生于诗礼官宦之家，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苏颂的广博知识与祖父苏仲昌的严格家教是分不开的。苏颂的父母对苏颂更是精心培养。其父苏绅一刻也不放松对苏颂的教育，他每到一地任官，都要为苏颂请教师、设学厅，并让叔父及名人子弟与其共读。后来，苏颂叔父苏緘及家人为国捐躯的壮烈之举，也深刻影响了少年的苏颂。优越的家庭环境、严格的家庭教育，对苏颂的成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苏颂的知识和品德都得益于家庭教育，所以他对家教就格外重视。他留给后人的家教资料，主要有《魏公谭训》及《感事述怀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家训诗”，还有载于《芦山苏氏大宗总族谱》的《苏氏家规（丞相魏公订）》，以及寓于其他诗文中的家教言论。

苏颂后人及现代研究者，整理出苏颂的家教思想，主

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重视文化知识。他给子孙的诚言是“非学何立，非书何习，终以不倦，圣贤可及”，要求子孙读书做到“广读博学”“学贵于勤”。二是道德先于文华。“道德先于文华”是苏颂家教思想的亮点。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苏颂虽然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但更注重道德的培养。他认为，道德为先的核心是恪尽职守，忠于君王。其最终大节，就是要求子孙在国家需要你献身时能毫不犹豫地为国捐躯。他在《魏公谭训》中不止一次地褒扬他的叔父苏缄为国捐躯的壮烈事迹，要求子孙世代牢记并发扬光大。在如何对待钱财、土地的问题上，苏颂要求子孙淡泊寡欲，诚信不欺。这也是苏颂“道德为先”的一个重要方面。三是身教重于言教。苏颂要求子女做到的，自己必先做到。他处处以“行完学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在苏颂大量的家训言论中，多数是以自身为教的遗训。他认为身教重于言教，身教比言教更有力量。四是持家以孝，治世以公。苏颂家教以孝为本，苏颂为子孙订立的“苏氏家规”开篇就训示说，“凡为子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内外有别，老少有序”。在《魏公谭训·家世》篇中专门记载了苏家孝悌传家的历史。他常以长辈及自身孝敬尊长的往事教育子孙。苏颂的家教还提倡治事以公，他在“苏氏家规”中训示子孙“处事必公”“为官必廉”，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在对待好友儿子及自己亲属的升迁上都一视同仁，并不特殊照顾。在宋神

宗违背任官之法，苏颂敢于一再封还词头，犯颜直谏。这一切，他都用以教育子孙，记入了《魏公谭训》中。

苏颂的家教十分成功，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古人说：家世兴旺难闯三个世代。苏颂的家族却多代相传，人才辈出。而且，据专家考证，苏颂家族入仕的家人中，没有出现过贪贿之官！面对苏颂的家规家训、家教思想，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油然而生：一个人了不起，可能还没什么，能“世胄相传清白训”，教育子孙，一代一代往下传，把子孙培养好、教育好，这才是真的了不起。

春秋代序，千年已往。山川毓秀、地灵人杰的古城同安，为华夏大地哺育了苏颂这样一位举世闻名的伟大科学家、杰出政治家。他在科技领域的辉煌业绩，世人共知，而作为杰出政治家，苏颂的廉政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精华。

“廉则昌，贪则亡”，总结古代廉政的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对当前也应有所启迪、有所借鉴、有所裨益。这也是廉吏苏颂影响当代、流传后世的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

苏颂，是中国的骄傲，更是福建的骄傲、厦门同安的骄傲！苏颂用自己的学识、用自己的品行，完成了独特的自我形象的塑造。中国古代历史上，如此情操高尚、道德博闻的官场楷模，同时又是知识博大精深的科学巨星实属难得，更值得今人学习！